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辛亥革命时期的 精英文化研究

罗福惠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时期的 精英文化研究

罗福惠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 / 罗福惠著.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5-6

I. ①辛… II. ①罗…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490 号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

著者: 罗福惠◎

责任编辑: 周柏青

责任校对: 张晶晶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69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经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开本: 640mm×96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13 千字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6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序

章开沅

记得是 1993 年暑假，我在日本饭能市美杉台风景区小住。有一天，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四条汉子”（久保田文次、中村义、小岛淑男、藤井升三）邀同餐叙。席间，中村义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们团体为什么取名辛亥革命研究会，而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吗？”我正琢磨其提问用意，他却自问自答：“我们没有把辛亥革命作为单一的历史事件来研究，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是作为社会整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我当即表示赞赏，并引为同调。

其实，北美、西欧学者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把社会学和社会史的方法引入辛亥革命研究，也是把这次革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尽管他们各别的研究或限于特定地区，或限于特定群体，或限于特定层面。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研究才得以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呈现于世界。

我国辛亥革命研究长期受单一政治事件狭小格局的束缚，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从 80 年代初开始，不断加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强调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用意亦在于此。80 年代中期以后，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辛亥革命研究者脱颖而出，他们或从事社会群体研究，或从事社会结构研究，或从事社会心态研究，都有颇具功力的专著问世，从而把我国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较高层次，并引起世界各地同行学者的重视。

本书作者对辛亥革命的长期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思想文化层面。他以国粹主义派研究为发端，顺理成章地进入章太炎思想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者转入中国现代化研究，但思想文化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还有很大进展。《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两部专著的先后出版，以及发表于海内外各种刊物的一系列论文，都表明作者在学术上已臻于成熟。作者日益善于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与更广阔的空间对历史作宏观的把握，近几年来在大型《湖北通史》的撰写与主编工作中，这个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1999年春天，在一次筹议举办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座谈中，我提出武汉地区的相关中生代历史学者应该回归辛亥，回报辛亥。意思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辛亥热”，为他们的迅速成长与展示才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而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领域的扩展，或是由于学科发展需要而衍生的领域转换，他们或多或少对辛亥革命研究有所疏离。现在为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家应该把研究的主要精力回归于辛亥，以新的更好成果回报对青年学者惠泽良多的辛亥革命史。此后大家即纷纷选题，以实际行动“回归”与“回报”，其中以本书作者撰著最为专心致志，并且成为最先交来全部书稿者。但此稿决非急就章，它是作者自己多年积累的创获，同时也充分吸收了海内外同行学者最新成果的精粹，含英咀华，厚积薄发，融会贯通，遂成有体系的一家之言。

此书不仅着力探讨辛亥至五四之间这个极为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历史接合部，而且还把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放在较大的时空环境中进行整体的考察，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理清源流。这就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恢弘的气势，并且在较高的层次上增进对于辛亥时期精英文化的理解。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不承认连续性就意味着割裂历史。多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受到政治事件格局的限制，而且前不与清朝中叶以前的历史衔接，后不与五四以后的历史沟通，因此成为一个80年若干历史片断的松散结合体。作者很早就注意矫正这种流弊，他在撰写《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和主编《湖北通史》的过程中，就非常注意在前后贯通上下功夫。

本书不仅对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丰富内容及其已经达到的高度作了相当细密的阐发，而且还注意到它对包括五四在内的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由于篇幅限制对于这种影响未能充分阐发，但他对于辛亥、五四两代人物、期刊、社团乃至话语之间连续性的粗略梳理，已能给此后的研究者以很大启发。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重点是“从宏观上分析辛亥文化的内容及那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特征”。与此相关的论著过去出版已多，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作者凭借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敏锐的史感与史识，往往在探幽索微之处透露出新的意境。即使是龚鹏程先生在此书撰写之前，已经运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关系来回顾不同性质的文化和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但那不过是《近代思想史散论》中的几段文字；而作者却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全面厘清了辛亥时期不同流派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消长变化。读者可以不尽同意他的某些具体见解，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是辛亥文化思想史研究的新的创获。

作者说：“历史本来没有断层，但历史研究出现了断层。”诚哉斯言！但愿有更多的学者在填补研究断层方面狠下功夫，让历史固有的连续性得以更完美地展现。

前 言

几十年来，我们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讲起，在思想文化方面没有追本溯源。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多只注重其政治革命的意义，对于这段时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的探讨不多，大而化之的概括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准备不足云云。十几年来，我参加过几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和提交会议的文章对辛亥时期的历史都很隔膜，把辛亥时期已经出现过的一些经济、文化现象或有关问题当作五四才有的新事物来大讲特讲，这使我们这些研究辛亥史的人颇感意外。治史学要作长时段的跟踪考察这个原则，似乎在这里不起作用了。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我们历来的历史阶段划分有关。半个世纪以来通行的说法是：1840年—1919年为近代，1919年—1949年为现代。而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一般总是重视新一个阶段的开端而忽视前一个阶段的结束。远的不说，试问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结束时期即鸦片战争前40年有多少了解？出于同样的惯性或定势，人们对五四之前的几年也研究得很不够。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不研究五四新文化，研究五四新文化的人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本来没有断层，但历史研究出现了断层。

还有一层原因是：我们历来把近代史上的革命划归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史上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属于前者，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幼稚软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辛亥时期的思想文

化到底有没有或者有多少有价值的“遗产”，并未引起人们重视。

尽管20世纪70年代就有五大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出版，80年代又有五大本《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问世，再加上陆续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和大部分辛亥报刊的复印本，资料不可谓不多，但多年来从整体上研究辛亥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成果依然很少。当然，这个问题屡次有人提及。例如，陈万雄先生在70年代末就曾撰文讨论辛亥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1991年就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马宝珠女士199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也把新文化的发端上溯到19世纪中叶。不过总的来说，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有关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著作，还没有把这个断层衔接起来，对于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丰富内容及其已经达到的高度，还有它对包括五四新文化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有待深入的发掘研究。

即使把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看作辛亥革命的终结，这个时期距离《新青年》的创刊为时也不过3年。许多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报刊都延续到了五四之后。五四新文化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林纾、马裕藻、柳亚子等，以及被视为“落伍”的林纾、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梁启超、杨度等，都跨越了辛亥和五四，是连接两个时代的人物。五四时期的爱国救亡大潮，直承辛亥而来；五四新文化高揭的“民主”、“科学”、“白话文”等几面大旗，辛亥革命时期就已举起；五四新文化批评孔子，检讨儒学，而这一开端乃在辛亥时期；五四后期出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辛亥时期的口号是“国民神圣”，鼓励人们努力摆脱“奴隶”的地位和思想；五四时期及以后有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的对立，其实辛亥时期就有“国粹”与“欧化”的分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广泛结成社团，并充分利用报刊争夺“话语权力”，这也是从辛亥时期的青年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那里沿袭下来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门类区分和各学科的内涵与形式，实际上是20世纪头十年基本形成的。这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化没有新内容、新特点，与前段相比没有发展变化，而是说研究五四新文化而不溯及辛亥时期乃至维新运动时期的文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而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必须从辛亥文化谈起。这不仅是因为辛亥革命及其准备阶段正好处在20世

纪的开头，尤其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内容十分精彩丰富，几乎涉及或蕴含了此后八九十年间全部的文化问题和思想趋势。

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动念。从宏观上分析辛亥文化的内容及那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特征，则是本书的重点。相信读者翻阅了此书，自然能对辛亥文化的价值、辛亥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联系等问题，产生新的认识。至于运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关系来回顾不同性质的文化和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是受到了龚鹏程先生《近代思想史散论》一书中几段文字的启发。我认为这也是讨论文化发展变迁的一个视角、一种思路。

业师章开沅先生 20 年前就呼吁加强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研究。这些年来，有关的经济史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文化史方面，郑师渠教授的《晚清国粹派》、桑兵教授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也已问世数年。不过，就我有限的见闻所知，从宏观的综合的层面上检视辛亥文化的作品，至今仍属阙如。因此不顾浅陋，在辛亥革命 90 周年纪念到来之际，捧出这本急就章，作为对先生当年呼吁的一个迟到的回应。至于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仍然有待来日，有俟于各位方家和诸多新进。

目 录

序	章开沅
前 言	(4)
第一章 时空与文化变革	(1)
一 对环境与时代之自觉	(1)
二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6)
三 中国文化变革的常见形式	(13)
四 对康严谭梁文化范式的扬弃	(24)
第二章 传统文化的主流、非主流与西学	(36)
一 主流文化的自救与困守	(36)
二 国粹派与“古学复兴”	(47)
三 固有学科和文化门类的转型	(61)
四 新型的社会科学萌芽	(82)
五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奠基	(94)
第三章 政治文化：时论与社会思潮	(102)
一 铸国魂，造国民	(102)
二 体制内改革的延续与探索	(126)
三 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	(153)
四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滥觞	(175)

第四章	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与集结 ·····	(212)
一	权力边缘与社会中下层的新生代·····	(212)
二	新式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特征·····	(236)
三	新式知识分子与新型团体·····	(255)
第五章	新式知识分子与文化新工具 ·····	(280)
一	报刊——新的文化传播利器·····	(280)
二	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	(297)
参考文献 ·····		(305)
后 记 ·····		(309)